

DAZHONG CHUANBO
YU XIBU MINZU DIQU SHEHUI BIANQIAN
YI GANSU ZANGZU DIQU WEILI

大众传播 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 ——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

张硕勋 王晓红 著

民族出版社

本书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黄河上游藏区社会变迁中的媒介角色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860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藏族影视文化传播效果与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860047)资助出版

大众传播 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 ——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

张硕勋 王晓红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传播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变迁：以甘肃藏族地区为例/
张硕勋，王晓红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8

ISBN 978 - 7 - 105 - 13999 - 6

I. ①大… II. ①张… ②王… III. ①藏族—社会变迁—
研究—甘肃省 IV. ①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804 号

策划编辑：康厚桥

责任编辑：康厚桥

封面设计：金 潇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pub.com>

印 刷：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90 千字

印 张：14.125

定 价：5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3999 - 6/K · 2462(汉 1370)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序

一、媒介：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长河中“在场的观众”（spectators present）

对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民族学、人类学关注的重点领域。在社会变迁长河中，传播作为文化的内在属性和基本特征，文化的差异性、社会性和符号属性决定了一切文化都在传播过程中生成和发展。同样，决定社会变迁的诸多要素要想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发挥应有的作用，都需要借助媒介这个“助产士”的力量。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科林（Charles Coughlin）]。正如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所认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①。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变迁中作为一个“入戏的观众”，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全景式”地记录并参与了社会发展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在论及传播媒介对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伟大社会运动的贡献时，传播大家施拉姆说：“书籍和报刊同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分配感到

^① 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1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普遍不满的时候，先是报纸，后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① 印刷媒介“大大扩展了新思想的传播范围，结果有助于挖掘传统权威的墙脚。……教会不能再用花言巧语来继续维持它在信仰方面的监护人身份。印刷术不仅给批评旧秩序的新政治理论提供了传播工具，而且还使人文主义学者得以重新出版古代人的著作，随之促进了经典原著的广泛研究，有助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② 文化传播和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交织在一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文化传播方式，一个民族的发展变迁历史也就是它利用媒介继承传统并创造新思想、新生活的历史。“我们既不完全像神，也不完全像动物，我们的传播行为证明我们完全是人。”^③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民族社会的变迁史就是它的传播史。

不同类型的媒介或传播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也呈现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类型。如果从传播技术更新的角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传播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革有着深刻的关系。换句话说，传播方式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各种力量的均衡被破坏，并由此产生新的社会和政治结构。”^④ 在媒介技术和社会变迁的互动作用中，新的媒介技术或传播形态出现以后，它所扮演的就是一个等待“入戏”的“观众”，它并不会自然而然介入社会生活，也不会使所有群体“雨露均沾”。在原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只有那些与有关势力的利益相一致的新传播技术才会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著，李启等译：《传播学概论》，18 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② [英] 伯特兰·罗素著，崔人元译：《西方的智慧》，222~223 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③ [美] 威尔伯·施拉姆 (Wilbur Schramm) 著，李启等译：《传播学概论》，39 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④ 杨伯淑：《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36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得到青睐和开发；反过来，这些新传播技术又会进一步协助和促进与之相匹配的势力的发展。“入场券”能让变迁的大门打开，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入场券”的人来说，大门仍然紧闭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为当时罗马天主教会所不容的新教改革运动（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形成燎原之势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不但教皇和僧侣统治者已经坐在了一堆干柴上，而且点燃这堆干柴的火种已经出现了，那就是印刷出版技术。用这个火种点燃这堆干柴的，则是新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们。……要是在一个世纪之前，路德对罗马天主教提出的批评起码要焖上数年才能变成火焰，即便是成为火焰，也不会形成燎原之势。但在路德所处的时代，只不过用了几十天，路德的拉丁语论文就被翻译成了德语并被摘要发送到全国各地。”^① 历史事实一再表明：媒介传播虽然不是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但它肯定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处在变迁中的社会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新媒介技术，历史必然会让其付出惨重代价。因为，在变迁的潮流中，拒绝不是明智的选择。

媒介是文化的载体。在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历史中，不同时期的文化有着不同的媒介呈现，从摩崖石刻、馍章、碑刻、建筑、简牍、书籍，到说唱、驿站，再到报刊、邮政、广播电视、互联网，文化传播现象在藏族世界中无所不在。对于那些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那些习以为常、得心应手、不假思索运用着身边的任何一个可能的媒介传递信息的人们，文化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民族文明的各个层面中，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这些媒介和着甘肃藏族地区社会的发展节奏，不间断地感受、记载、推动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并以一种特定符号、以相对稳定的姿态或隐或现地作用于那些处在变迁旋涡中的人们。正如杜威所说：“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

^① 杨伯淑：《全球化：起源、发展和影响》，367～3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nication) 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Dewey, 1916:5) 一切民族内在的文化特质的延续,都必须通过荷载。没有传播媒体的持续采用,甘肃藏族地区政治、经济、宗教、家庭、文化演变的历史根本无从谈起。“除非是人民要求变革,否则变革就不会顺利地或卓有成效地进行。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① 传播构建了藏族大众的生活世界,也构成了我们研究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宽阔“场域”。

二、我——进入“他者”世界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ors engage)

海根博士(E. Hagen)在《社会变迁的原理》(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强调了在社会变迁研究中科际整合方法的必要性,雷格斯(F. W. Riggs)则提出应用“泛科际整合方法”(pan-disciplinary approach)来探索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现象间的“功能关系”。他认为,研究者必须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分子,在田野中,对调查对象的一切陈述都是记述性的,不作任何规约的、价值主观的评断,只讲“实然”,不讲“应然”。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较为客观地就事论事,达到斯宾诺莎所说“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的境界。本研究希望运用民族志研究方法进行有关甘肃藏族地区媒介传播与社会变迁问题研究,这一活动正如格尔兹(Geertz C.)所说的“研究地点并不是研究对象,人类学家并不是研究村落,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② 开展本研究需要我成为“他域”文化的“入戏的观众”,深入到“文化持有者”的群体中去访谈、体验、观察、记录、思考,并试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著,金燕宁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43~4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②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ord Geertz)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2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图回答甘肃藏族地区大众传播的媒介生态、农牧民接触现代传媒的方式、拥有情况、接触行为、动机与偏好、效果与期待等一系列问题。

而在“入戏”前，我对甘肃藏族地区的一切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和影视片段的“固定成见”中：高山雄伟、草原辽阔、牛羊遍地、歌声悠扬，寺院中香烟缭绕、经语低回，山路上“长头”不断，经幡飘荡。打开这一“剧场”大门的是我的导师王洲塔先生，而“入场券”则是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资料“换”来。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2009年6月26日，我一头扎进了这个我自以为已经“熟悉”的世界。但是到田野点之后，我很快就遇到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爵士曾碰见的问题：“不管看起来多么令人惊讶，在你具有熟悉的第一手经验的文化脉络中做田野工作，看来比从完全陌生人的幼稚观点出发从事田野工作要困难得多。”^① 尽管我致力于得到这一文化的内观，但由于语言沟通的障碍、访谈对象的戒备，使得最初几天的调查活动进行得十分艰难。洮河边的甘肃藏族地区和中国其他较偏远的农村一样，依然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熟人社会”，每一个村口似乎都竖立着一块无形的路牌，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陌生的“来客”：“非请莫入。”这些情况使我感受到单纯依靠问卷调查是一项危险的事情，问卷调查太容易体现“我们”的而不是调查对象的概念和范畴，所设计的问题构造了大量人为的“知识”，很少与接触对象体验的现实相关。同时，由于恐惧、警惕、沟通障碍、猜度、精疲力尽、敌意、对利益的期望，访谈对象可能给出有偏向的或错误的信息。

拿到“入场券”到最后入场就座的道路依然漫长，最初的遭遇反映了我的无知和浅薄，因为，文化——无论是有形、可观察的物质文化还是无形的、需要不断揣摩的精神文化都会附着在每一个具

^① [美] 哈维兰著，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1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体的“文化持有者”的日常行为中，并从他们参与的各种仪式活动和日常行为中缓慢地渗漏出来，任何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地考察都是不可靠的。我需要学会与跟随而至的当地官员周旋，需要学会当地的生活方式并与村落里的“意见领袖”交朋友。^①

CNGJ(男，藏族，41岁)：美武乡政府工作人员，皮肤黝黑。笔者在合作市美武乡为当地一个活佛修建的寺院落成庆典那天认识的，粗嗓门，可以用简单的汉语字词交流，啤酒是我俩熟知的最初媒介。

GGC(女，藏族，19岁)：合作一中高三学生，美武乡上浪坎上村人。调查时，她已经被甘肃中医学院录取，现在已经是我家的常客。我第二次进入美武乡上浪坎上村时，经CNGJ介绍认识了GGC，她是我在美武乡调查时最得力的助手，大部分访谈和调查是在她的“转译”下完成的。晚上，她和几个伙伴的歌舞为我寂寥的时光平添了许多欢乐。

SQ(男，藏族，25岁)：他的妹妹WMC带我到她家的牧场游玩时认识的，当时他和他的新婚妻子照看着70亩草场。他随身携带着MP3，里面储存着上百首当时草原上正流行的歌曲。可能是新婚的原因，和我们在一起的几天，他不断地伴着MP3哼唱流行歌曲《亲爱的姑娘，我爱你!》。草原的风雨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相比之下，他的新娘显得年轻得多。他很喜欢摆弄我的数码摄像机和照相机。调查期间，他用摩托车带着我参加了邻村的一场婚礼，并以“解说员”的身份向我介绍了当地近十年婚俗的变化。

WYH(男，藏族，54岁)：甘南州广播电视局局长，身材魁梧，国字脸，为人豪爽，州塔老师的好朋友，我在合作市调

① 在本书的访谈资料中，所有人名以每字拼音首字母代替的简写方式指代。——
编辑注

查期间的“信使”。在他的安排下，我先后访谈了甘南日报社副主编 MZZ、甘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LLY、甘南电视台台长 SHF、甘南州州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 SUNB、甘南电视台影视剧译制中心主任 WX、甘南电视台播出部中心主任 QH、中国移动甘南州分公司网络部总经理 WSY、甘南州邮政局报刊发行部主任 PZR 等二十多人。调查结束后，在导师家里多次相遇并畅谈。WYH 为我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可信资料。

WL（男，藏族，51岁）：卓尼一中校长，中等身材，精明强干，热情好客，卓尼县教育工作的“权威人士”和“意见领袖”，是我调查大众传媒对当前甘南州教育事业影响的“网络中心”。在卓尼调查的日子里，他的“盛宴”满足了我的和我的调查团队“贫困”的胃肠。

WK（男，藏族，44岁）：卓尼县木耳镇中心小学校长，WL的弟弟，浓眉大眼，酷似电影演员朱时茂。调查期间，我们一直喊他“茂哥”，他很乐意我们这样叫他。他的“人望”帮我们减去不少调查的阻力，并顺利地访谈了木耳镇的 LZR 镇长和卓尼县木耳镇多坝村村主任 CYQ。

.....

时光已经逝去几年，这些熟悉的面孔时时涌现在我的脑海，他们的友善使我迈过了最初“入戏”时的障碍，成功地完成了本研究的第一次田野工作。2010—2013年，每年1月和7月，我和我的团队多次去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和武威天祝藏族自治县开展补充调查。前后发放大型调查问卷216份，访谈49人，拍摄录像257段、照片1000多张。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原来迷乱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原来设计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地被修正、厘清。

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很快中断，调查得来的数十万字资料只是一个个“文本”的“碎片”，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知识储备得不足，让我面对这些材料束手无策。“深描”这一“大戏”让我痛苦

不堪。近三年时间里,晨昏交替间,我系统学习了所需的知识,做读书笔记210余万字。在这些孤独而漫长、痛苦而充实的日日夜夜里,老师的鼓励、亲友的期许帮我翻越了一个又一个横亘在眼前的山头。阅读使我受益匪浅,资料一点一滴被梳理出清晰的脉络,问题被一个个凝练出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一直伴随研究的整个过程。

至此,凝练的问题逐渐形成一个逻辑的线条,最终形成我构建这篇论文的总体框架。目前,关于媒介信息传播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少,存在许多研究空白。本研究希望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梳理和现实影响的横向解剖两个方面展开,希望既能将既有的零散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甘肃藏族地区媒介生态、发展变迁和媒介使用状况,同时又能超越对现实状况的浅层描述和简单呈现,进行理论概括与创新。

本书内容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甘肃藏族地区媒介生态、大众媒介的发展历史、媒介使用与功能发挥研究,包括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回答了“要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需要研究这些问题”以及目前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和研究价值。第二章采用比较分析法,阐述甘肃藏族地区邮政、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与网络媒体的发展历史及其对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的推动与反映。以此来说明媒介信息传播对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的影响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发端之始就已存在,并贯穿于这一社会发展的所有阶段,目前甘肃藏族地区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原有影响在空间上的延续、速度上的加快和力量上的倍增。

第二部分是现代传媒语境下的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研究,包括第三章至第九章。第三章跳出前面宏大的历史叙事,进入现实层面,采用典型分析法,以合作市市区和美武乡、卓尼县木耳镇、临潭县冶力关镇市民/农牧民的大众媒介使用情况为典型个案,“深描”甘肃藏族地区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现状,分析甘肃藏族地区媒介生态、农牧民的大众媒介拥有情况、接触动机与偏好、农牧民对大

众媒介传播内容的利用及评价,最后探讨了甘南藏族自治州传播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趋势。第四章至第九章以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培养理论”“议程设置”“创新扩散”等理论为依托,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研究大众媒介与甘肃藏族地区的行为文化(流动与交往、生计方式、生活方式、婚姻家庭与丧葬)、物质文化(服饰、建筑、饮食)、制度文化(社会组织、公共生活、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宗教信仰、教育)等领域变迁的关系。期望通过这些研究来揭示大众传播对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的现实影响,从而在第一部分对甘肃藏族地区媒介发展纵向梳理的基础上完成大众传媒对当代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发展影响的横截面的描述,建立本研究的完整体系。

目 录

第一章 研究意义和理论准备.....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1)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6)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	(24)
第四节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31)
第二章 我国藏族地区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	(45)
第一节 我国藏族地区近现代报刊的发展与社会变迁	(45)
第二节 我国藏族地区广播、电影、电视媒介的发展与 社会互动	(59)
第三节 “阳光信道”:我国藏族地区网络传播起步	(73)
第三章 甘肃藏族地区大众传播现状与社会发展调查	(75)
第一节 甘肃藏族地区大众传媒存在与发展的媒介生态 ...	(77)
第二节 甘肃藏族地区大众传媒信息传播现状调查	(96)
第三节 当前甘肃藏族地区信息传播新格局的形成与演变 趋势.....	(136)
第四节 从寺院、广场到家庭影院:甘肃藏族地区“信息场” 的偏移.....	(148)
第四章 大众传媒的使用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交往和 流动.....	(169)
第一节 大众传媒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交往.....	(170)
第二节 得乐园?失乐园?——大众传播与甘肃藏族 地区社会流动.....	(194)

第三节	大众传媒引导下甘肃藏族地区社会交往与流动的困惑与对策·····	(213)
第五章	新媒体技术普及与甘肃藏族地区生计和生活方式的重构·····	(232)
第一节	大众传播对甘肃藏族地区传统生计方式的解构·····	(232)
第二节	大众媒介引导下的甘肃藏族地区社会生活方式变迁·····	(241)
第三节	影像介入下甘肃藏族地区农牧民消费方式变迁·····	(253)
第四节	甘肃藏族地区闲暇生活变迁中的媒介主导·····	(260)
第六章	大众媒介语境下甘肃藏族地区婚姻家庭文化变迁·····	(265)
第一节	媒介符号视角下的甘肃藏族地区婚姻家庭文化变迁·····	(265)
第二节	媒介涵化与甘肃藏族地区生育文化变迁·····	(285)
第七章	大众传播与甘肃藏族地区家园、服饰及社会组织变迁·····	(291)
第一节	电视镜像下甘肃藏族地区的物质文化变迁·····	(291)
第二节	大众传媒的宣传与甘肃藏族地区社会组织和公共生活变迁·····	(309)
第八章	大众传播与甘肃藏族地区宗教和教育变迁·····	(332)
第一节	媒介现代信息传播与甘肃藏族地区宗教文化变迁·····	(333)
第二节	数字媒介资源的运用与甘肃藏族地区教育发展·····	(353)
第九章	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中的媒介角色与民族文化的回应·····	(376)
第一节	甘肃藏族地区显性变迁之下的隐性嬗变·····	(377)

第二节	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中大众媒介的角色 冲突与调适·····	(400)
第三节	大众传媒语境中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的再 思考·····	(416)
主要参考文献·····		(427)
后 记·····		(435)

第一章 研究意义和理论准备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一、选题的缘起

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是多维的，本研究以“碰撞”“断裂”与“跨越”三个关键词来描述，主要研究大众传播与我国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学者研究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变迁问题都必须考虑的时代背景，我国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与大众传播关系研究也不例外。经过漫长的器物传播、亲身传播、人际传播、印刷传播之后，甘肃藏族地区媒介传播形态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一道步履蹒跚地进入电子传播阶段。相对于我国内陆地区，处于边陲地带的甘肃藏族地区电子传播起步晚、起点低、发育迟缓，但媒介的信息传播是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的主导因素之一。要研究甘肃藏族地区媒介信息传播与社会变迁历史，只截取电子传播这一时段是远远不够的。从第一份藏文报纸诞生^①到现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跨度，所以在“全球化”语境下研究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变迁，必须将镜头

^① 据白润生先生的研究，西藏最早的报纸当属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创刊的《西藏白话报》，其创办人是清廷最后一位驻藏大臣联豫和帮办大臣张荫棠，它也是西藏地区第一家近代报刊。

拉长,历史地观察大众传播时代不同媒介在甘肃藏族地区的采借和运用,以此来分析目前电子传播时代甘肃藏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特别是新媒介技术“助推”之下甘肃藏族地区社会方方面面的跨越,才会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才能更理性地看待甘肃藏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差距和媒介发育的迟滞,也才能在“全球化”的喧嚣中探索甘肃藏族地区媒介和社会的互动发展之路。对此,本研究采用两种描述方法——共时法和历时法——的结合,前者只描述特定时期内的甘肃藏族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后者则对这种变迁进行长时段的描述与归纳。

“全球化”一词是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在西方学者的著述之中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宣布“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时代已经到来了”,“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①“全球化”俨然成为了一支极具张力的“魔杖”,使得“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②。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展,强势文化价值观念和内容随着资本的流通而逐步渗透到这些边缘地带,冲击着这些边缘地带的传统文化;同时边缘地带的传统文化在与强势文化的对抗、互动和融合中,出现了边缘文化渗入到强势文化主体中的现象。在藏族和国内其他民族的长期交流过程中,这种文化的碰撞和吸纳就一直没有间断过。改革开放以来,数字多媒体传播在我国迅速普及,人流、物流、信息流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流动频率越来越高,处在“边陲”地带的甘肃藏族地区社会传统文化在接受西方文化“撞击”的同时,也承受着国内其他较发达的民族文化的广泛冲击。这种双重“碰撞”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明显,

①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参见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2页,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

② [美]赛曼·杜林著,王宁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140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